

由《王世杰日記》看重慶會談後到政治協商會議前的中共談判策略*

陳英杰**

對日抗戰勝利後，在人民對國家和平發展的期待及國際強權的影響下，儘管國共雙方在接收與復員的競爭中劍拔弩張，終究促成了重慶會談的舉行。經過40多日的協商，國共雙方簽訂了協議，但自重慶會談結束到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隨著美、蘇在戰後的全球戰略佈局與競爭，加上國共雙方在復員、接收與資源的爭奪，使得中國的局勢產生非常大的變化。

本時期為二次大戰後中國較有契機建立民主制度的階段，不管是赫爾利(Patrick Jay Hurley)斡旋下的重慶會談，或是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調處的「第一次停戰談判」，以至朝野各黨派齊聚一堂共商國家發展的政治協商會議，無不引起當時國內外的關注。雖然國共雙方在談判桌上的努力，最終都功虧一簣，但當時雙方折衝交涉所留下的經驗，仍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將以《王世杰日記》為中心，對重慶會談後至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中共在國共交涉過程的主張與行為做一探討，藉以瞭解此時期中共的談判作風與

* 本文撰寫及修改期間，承蒙胡春惠教授和林能士教授，以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特此致謝。

** 德霖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策略。

關鍵字：談判策略、國共關係、王世杰、周恩來、馬歇爾

一、前言

對日抗戰勝利後，隨著國民政府蔣介石主席提出邀請，在人民對國家和平與發展的期待及國際強權的影響下，儘管國共雙方在接收與復員的競爭中劍拔弩張，終究促成了重慶會談的舉行。雙方經過 40 多日的折衝，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但正如同毛澤東在〈關於重慶談判〉一文中所言：「已經達成的協議，還只是紙上的東西，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事實證明，要把它變成現實的東西，還要經過很大的努力。」¹由於雙方在許多重要的議題上歧見尚深，加上缺乏互信的基礎，使得簽字的協議，成爲一紙虛文。

自重慶會談結束到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此階段歷時不過 3 個月，但隨著美、蘇在戰後的全球戰略佈局與競爭，加上國共在復員、接收與資源的爭奪，中國的局勢卻產生非常大的變化。

此時期的國共談判大致可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 1945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25 日周恩來返回延安爲止，雙方在重慶分別由國民政府代表(以下簡稱國府陣營)王世杰、張群、邵力子和中國共產黨代表(以下簡稱中共陣營)周恩來、王若飛，就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名額與調解軍事衝突等議題展開談判。第二階段在 1945 年 12 月中旬中共代表抵達重慶，加上美國特使馬歇爾將軍(George Catlett Marshall)來華後，雙方在 12 月 27 日恢復談判，並自 1946 年 1 月 7 日起，改由張群、周恩來和馬歇爾組成三人會議進行會談，至 10 日簽立協定止。此時王世杰則於幕後擔任國府陣營的智囊，協助提供對策，並準備參加政治協商會議。

總括來看，本時期爲二次大戰後中國較有契機建立民主制度的階段，無論是赫爾利(Patrick Jay Hurley)斡旋下的重慶會談，或是馬歇爾調處的「第一次停戰談判」，以至朝野各黨派齊聚一堂共商國家發展的政治協商會議，無不

¹ 毛澤東，〈關於重慶談判〉，《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1991）第4卷，頁1156。



引起當時國內外的關注。雖然國共雙方在談判桌上的努力，最終都功虧一簣，但當時雙方折衝交涉所留下的經驗，仍值得深入探究。

近年國共談判的檔案資料逐漸解禁開放，呈現出更多的史實與題材，國共談判的相關研究也與日俱增，不過多數的研究都將重點置於重慶會談或政治協商會議，對於這兩次重大事件過渡期間的國共交涉，除了吳淑鳳〈從《王世杰日記》看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和汪朝光〈戰與和的變奏：重慶談判至政協會議期間的中國時局演變〉外，較少有專文做深入的探討。事實上此時期的國共談判具有承先啓後的作用，加上其談判的議題多牽涉政權、軍事動員與戰後利益的分配，任何的談判結果均對中國日後的發展有重大影響，故此階段國共談判的內容，有必要透過更深入的探討，提供給世人參考。

本文的研究將以《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為中心，對重慶會談後至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中共在國共交涉過程的談判策略做一評析，藉以瞭解該時期中共的談判作風與特色。本文之所以採取《王世杰日記》，係因日記的作者——王世杰自 1938 年 4 月即擔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負責外交、宣傳和政治問題的規劃等，因而在國際關係和外交問題上，成為蔣介石倚重的智囊。此外，王世杰也擔任過參政會秘書長，雖於 1943 年 9 月辭掉該職，但仍為參政會主席團之一，故其對朝野協商也早有瞭解。王世杰於 1943 年 10 月即奉國民政府蔣介石主席之命與董必武就改善國共關係交換意見，並自 1944 年 5 月偕張治中代表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林柏渠展開談判。²王世杰豐富的政治經歷，加上為人嚴謹，其長時間所撰寫的日記也就成為研究中國現代政治發展，可靠而完整的素材。

此外本文也將運用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的史料、中共重慶市黨史工作委員會編《重慶談判紀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共南京市委員會編《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和《馬歇爾使華報告書(Marshall's Mission to

² 王世杰(1891-1981)，湖北崇陽人，巴黎大學法學博士。王世杰在1944-1946年間歷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1938-1946)、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1944-1945)及外交部長(1945-1948)等職務。



China)》等資料，並佐以其他的年譜、史料作為探討的素材，分就幾個面向進行探討：首先就重慶會談的結果與留下的問題作一回顧；其次探討戰後接收初期的國共談判，包括在戰後接收的過程，美、蘇等國際強權如何考量東北問題？國共對接收的衝突問題如何協商？中共在此時期又採取了何種談判策略等。第三，探究馬歇爾使華後如何調處國共間的衝突，包括美國杜魯門總統(Harry S. Truman)採取何種對華政策？又賦予馬歇爾哪些使華任務？在馬歇爾的調處下國共又如何協商？以及此時中共所採取的談判策略為何等。最後對本階段的中共談判策略做一歸納與總結。

二、重慶會談留下的難題

隨著日本無條件的投降，除了迎接勝利的喜悅外，國民政府卻也必須同時面臨著諸多難解的問題，包括戰後復員及重建、共產黨的問題、對蘇外交問題、東北問題、新疆問題等。國共雙方的互動也由於美蘇等國際勢力的影響而日益複雜。

面對國內外期盼以和平的方式處理戰後問題的局勢下，國民政府蔣介石主席在1945年8月14日親自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家大計。在蔣介石3次電邀之後，毛澤東考量由於蘇聯的暗示、為了塑造民主和平的印象、爭取群眾和輿論的支持以及有中共的軍隊做為後盾，決定到重慶參加會談。³

(一)重慶會談的結果

自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抵重慶到10月12日返回延安為止，國共雙方領導人蔣介石和毛澤東至少進行了8次的直接商談，雙方代表更是進行了十餘回合的談判。談判的議題涵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戰後受降接收、中共佔領區(解放區)的處理等十多個項目，雙方廣泛而深入的交換意見，最後在10月10日

³ 毛澤東參加重慶談判的理由，可參閱〈張鎮呈蔣委員長有關毛澤東於重慶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談話內容報告〉，《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後中國(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35-36。及毛澤東，〈關於重慶談判〉，頁1157-1158。



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

不過如果細究《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的內容，就可發現有幾項關鍵的議題，事實上是以「擱置議題」的方式處理，把許多尙無共識的項目留待日後再議。而雙方達成共識的部份，也多需要進一步建立憲政或配套制度方能實施。加上受限於雙方互信的不足，⁴使得重慶會談的共識很難具體落實。有關重慶會談的結果與待決問題，茲彙整如表 1：

表1、重慶會談的結果與未決問題對照表

會談結果與問題 主要議題	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	會談未決之問題
基本方針	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	1. 重慶會談所簽訂的會談紀要對國共雙方無實質的約束力。 2. 蘇俄延遲撤軍，影響國軍接收，中共勢力在東北迅速擴大。
政治民主化	結束訓政，實施憲政。 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會談紀要中對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之時間、方式、參與人員等，均懸而未決。
國民大會	雙方未能成立協議，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	1. 需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協議後才召開國民大會，使制憲工作遙遙無期。 2. 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方式、名額與舊國代是否續任問題，待繼續協商。
人民自由	保障人民人身、信仰、意見及集會結社自由。	需透過制憲，由憲法保障。
黨派合法化	各黨派法律之前平等。	第三勢力活躍，對政治民主化的呼聲與需求迅速增加。
特務機關	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	需進一步確立制度。
釋放政治犯	政府準備辦理，中共可提出名單。	需進一步辦理。
地方自治	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	需透過制憲，建立制度。
軍隊國家化	中共陣營：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分期實施計畫，並重劃軍區，確定徵補制度，共軍可由現有數目縮編至24個師至少20個師的數目，並逐步撤退應整編的部隊至隴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的解放區集中。 國府陣營：共軍縮編為20個師的數目可以考慮。駐地問題，由中共提出方案，	1. 整編軍隊數目、重劃軍區、參加軍事委員會問題，待雙方繼續交涉。 2. 待組成軍事三人小組(軍令部、軍政部及第十八集團軍各派一人)。

⁴ 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即認為國民政府畏懼和不信任蘇聯，並確信中共為蘇聯所扶植，不相信中共的誠意。而中共也不信任國民政府。參閱George Catlett Marshall,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Arlington, Virgini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n, 1976), Vol. I, p. 7.



	討論決定。 組織軍事三人小組。	
解放區地方政府	由雙方繼續商談具體解決方案。	待雙方繼續交涉。
奸偽處置	依法辦理。	為減少戰後接收阻力，部分投日份子成為收編對象，引發民怨。
受降處理	在中共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慮。	戰後接收衝突，尤以華北與東北地區最烈。

資料來源：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後中國(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29-30、39-45。

(二)重慶會談後的困局

重慶會談雖是由國民政府蔣介石主席親自邀請毛澤東商談，但所簽訂的會談紀要在後續的執行上，依靠的是雙方的互信，協議本身對雙方並無實質上的約束力，因此對解決中國發展的困局並無甚大助益。

首先就談判議題的處理方式來看，在各界高度的關注下，重慶會談在一定要有談判成果的壓力下，國共雙方雖然在最後達成《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但有許多關鍵的議題，如政治民主化、國民大會及軍隊國家化等問題，卻是懸而未決，把問題的解決寄託在無確切召開時間與運作方式的政治協商會議和軍事小組，在國內外局勢快速的變遷下，衍生的爭議更難處理。

其次，在政治民主化的安排上，相關的議題和協議內容以「連環套」的方式來設計，就國府陣營而言，固然在主導政局發展上可保有較多的彈性，但卻也給中共陣營迴避爭議問題的空間。例如雙方都對實施憲政、保障人民自由和平等權、實施地方自治等原則有所共識，但這些議題的落實卻必須先制定憲法。依照國府陣營的規劃，制定憲法必須先召開國民大會，而國民大會的組織、集會方式和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辦法，又必須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由各黨派代表商討。然而重慶會談對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時間、方式、參與人員等問題均未解決，留待國共雙方進一步協商。國共的協商在當時並無固定的模式，缺乏持續性的溝通管道，加上在 10 月 10 日晚上毛澤東、周恩來和王若飛向蔣介石辭行並留宿林園時，毛澤東提出延期召集政治協商會議，讓蔣介石大感詫異，蔣心中覺得「共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



之不若矣」，⁵雙方的互信更爲薄弱，王世杰只好「促其於返延安後來渝續商參加政治協商會議」。⁶雖然 11 日毛澤東表示將讓周恩來與王若飛繼續留在重慶商談未決事宜，⁷但雙方何時繼續商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仍是未定之數，要落實政治民主化、實施憲政更是遙遙無期。

再者，戰後的接收與復員，引發權力和資源重分配的新問題，例如對東北的接收，國共雙方並未詳加討論，更沒有明確的規範。對於已發生的國共軍事衝突，也未協議停戰，邵力子指出：「會談紀要初稿原有十三項，最後一項的原文是關於避免衝突問題，中共方面提出停止一切武裝衝突，各部隊暫留原地待命；政府方面表示：『一切武裝衝突自須即行停止，只要中共部隊對中央軍隊之行進不加阻止，即無問題。』……到會談紀要快發表的時候，中共主張刪去這一項，中央也表同意。」⁸這使得雙方在談判後，中共持續擴張其勢力，軍事衝突愈演愈烈，《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形同具文，讓人民陷入內戰的恐慌，也讓政府背負更多的壓力。

最後在軍隊國家化與中共佔領區(解放區)的部份，由於關係到軍權與地盤，一直是雙方在重慶會談攻防最激烈的議題，因此儘管大家都認同軍隊國家化的目標但卻難有結論。故在會談紀要中，最後以「各自表述」的方式，將雙方對問題的處理方案分別列出，並同意組織軍事三人小組(軍令部、軍政部及第十八集團軍各派一人)，處理整編軍隊、重劃軍區和參加軍事委員會等問題。由於如何組織三人小組也是個待討論的議題，軍隊國家化與和平建設也就成爲遙不可及的目標。

⁵ 國共雙方在重慶會談中，都認同要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並預定於10月底舉行。參見〈蔣主席日記民國34年10月11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後中國(二)，頁105。

⁶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1945年10月10日記事」，頁191-192。

⁷ 余湛邦，《我所親歷的三次國共談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4)，頁45-46。

⁸ 邵力子，〈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經過〉，輯於《重慶談判紀實1945年8-10月》(重慶：重慶出版社，1984)，頁360。



三、戰後接收初期的國共談判

戰後國民政府對東北的接收，由於蘇聯軍隊的介入、自身動員能力的不足和受中共勢力擴張等影響，進行的並不順遂。熊式輝當時曾有援引外力的想法，他在重慶會談後與蔣經國飛往東北前，曾提議「蘇軍撤退期屆，而我尚無軍隊到東北接防，將為共產黨軍隊所乘，不如責成蘇軍緩撤。」王世杰則認為「蘇軍如有意扶植共軍，則彼多留一日，結果將更壞一日，」且若由國府請求蘇軍延後撤離東北，將讓蘇俄日後有所藉口不撤軍。⁹然而中國東北局勢日後的發展，卻如同王世杰所擔憂的，不但成為美、蘇角力的籌碼，更成為國共廝殺的戰場與談判的議題。

(一) 蘇軍延撤與暗助中共

為了爭取美、蘇的支持迫使日本早日投降，蔣介石在抗戰結束前夕，先後派宋子文和王世杰到蘇聯，依照《雅爾達協定》(Yalta Agreement)的原則與蘇聯商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外蒙古獨立，和將東三省的中東與南滿鐵路、大連及旅順兩港口的權益劃給蘇聯，換取蘇聯承諾尊重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及新疆事變、定期撤軍等，這使得中共的領導人一時頗為緊張。當時負責與蘇聯簽約的外交部長王世杰認為：「中蘇條約簽訂以後，中共愈覺無援，只要中央政府能再努力於政治解決，形勢當可好轉。」¹⁰

不過在蘇聯亟欲控制中國東北戰略和經濟資源的企圖下，東北局勢並未如王世杰在8月中旬所預期的好轉。依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應在日本投降後3週內撤軍，如有延期也要在3個月內完成，因此蘇聯依約最遲應在1945年12月初撤離東北。然而隨著大戰結束後國際權力結構的改變，蘇聯為了趁機擴展其勢力範圍而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逐漸形成對立。王世杰慨歎美、蘇關係的惡化，「使得我國今後外交工作日趨困難，我之政策在

⁹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0月11日記事」，頁192。

¹⁰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8月18日記事」，頁155。



謀中美英蘇之合作。」¹¹

爲了辦理東北的接收事宜，國民政府在 1945 年 8 月 31 日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轅，並任命熊式輝爲行轅主任。但熊式輝面對內有中共軍隊擴張，外有蘇聯掣肘的情形下，在東北的接收工作進行的並不順遂。其中蘇聯在 10 月份開始公開干涉國軍的接收，國民政府在處理對蘇的外交工作上也日趨困難。王世杰認爲「我軍開往東北事，蘇聯『堅決反對』我方自大連登陸，意謂大連爲自由港也，實則此種解釋純屬強詞。」王世杰雖向蘇聯大使反駁，但「蘇方仍堅持，蓋我所用之運輸艦爲美艦，頗招蘇方之妒，而國共談判近日復無進展，自應爲蘇方所不滿也。」¹²只好請蔣介石透過蘇聯大使促其政府同意國民政府軍隊能自大連登陸。

10 月 23 日熊式輝由長春返回重慶，表示蘇軍有撤退之意，但在該地「紀律壞，奪去物資機器甚多，且有意扶植共產黨軍隊。」對於東北局勢的發展，由於蘇聯具有軍事主導權，王世杰建議熊式輝「此時必須鎮靜容忍。」王世杰於 25 日向蘇聯大使表示，由於大連登陸問題未經雙方商討同意，國軍將暫時不由大連登陸，「但將在營口及葫蘆島登陸，請其通知其政府及馬林洛夫斯基元帥(Rodion Y. Malinovsky, 東北紅軍司令)。」¹³但 10 月 29 日蘇聯大使回覆王世杰，認爲國軍「自營口及葫蘆島登陸不無問題」，王世杰瞭解實際上是中共軍隊在葫蘆島附近，於是建議蔣介石依據原訂方案，設法在營口等地強行登陸。¹⁴

蘇聯爲了擴大在東北的利益，但又不願公然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而以縱容中共軍力的發展來拖延國民政府的接收。因此王世杰在 11 月 5 日下午要卜道明司長向蘇聯大使聲明：「(一)、蘇軍不可任令中共軍入營口，否則國軍將不能如期接防；(二)、我軍政長官在東三省絕不容忍任何反蘇組織

¹¹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0月12日記事」，頁193。

¹²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0月19日記事」，頁196-197。

¹³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0月23、25日記事」，頁199-201。

¹⁴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0月29日記事」，頁202-203。



之存在。」¹⁵然次日熊式輝發現，「蘇軍已自營口撤退，任令中共軍佔領營口。我從營口登陸之計畫又將完全不能實現。(因美國運輸艦並不願在國軍與中共軍衝突之情形下駛入營口)」¹⁶

到了8日王世杰認為「東三省之蘇軍既容許中共軍佔領營口、葫蘆島等港口，又不願保證我政府軍登陸之安全，則在實際上東三省無異由蘇軍交給中共軍隊。」蔣介石於當日下午召集宋子文、張群、白崇禧、吳鼎昌、陳布雷和王世杰等七人商議東北局勢，蔣介石打算和蘇聯攤牌，提出「只有將東北行營撤退至山海關(但聲明不放棄東北)，使蘇聯違約之真相大白於世界；我亦不因顧慮東北之收回而與蘇聯繼續敷衍。」¹⁷王世杰認為此一作法在道義上雖具有正當性，但結果將使中共及外蒙受蘇聯的接濟與支援，反而可能引發大規模及長期的內戰。而且因為東北接收挾帶著中共問題，表面上是中國內部的衝突，但在美國不願介入的情形下，此時和蘇聯決裂，亦不見得能得到友邦有效的支援，故建議蔣介石慎重考慮。

在國民政府試圖和蘇聯進一步緩和關係後，11月9日駐華美軍總司令魏德邁將軍(Albert Wedemeyer)剛好從華盛頓返抵重慶，並轉達美國的對華政策：

- (一)、美國大總統、國務卿、聯合參謀會議一致聲明並保證援助中國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
- (二)、在華美軍避免捲入中國內戰，如有此項危險時，須即自華撤退，現美國輿論正在用壓力加諸杜魯門身上；
- (三)、援華任務派遣軍事顧問團裝備美軍水準十個師，alpha 水準四十個師，十八個空軍隊與輕艦隊；
- (四)援助接收東北，但不派美軍進入，一切問題由中蘇直接談判；
- (五)、日本、朝鮮不主張駐兵，越南華軍撤退，以節兵力；
- (六)、早日解決中國戰區日軍武裝，反對利用日偽軍隊，日僑應早日遣送歸國；
- (七)、從速建立中國輕工業，吸收外國技術員工，反對利用日本技術人員；
- (八)、希望能充分獲致蘇中交涉

¹⁵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5日記事」，頁208。

¹⁶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6日記事」，頁208-209。

¹⁷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8日記事」，頁209-211。



真相以資研究；(九)、美軍將於明春以前撤退。¹⁸

從這魏德邁轉交給蔣介石的備忘錄中，可以清楚了解美國政府由於輿論的壓力，杜魯門不願美軍陷入國共的紛爭，也不願和蘇聯在中國有所摩擦，因此只打算提供國民政府有限度的協助。在得不到美國更多的奧援下，當天蔣介石和王世杰等人繼續商討東北及中共問題時，張群曾建議由蔣介石和史達林(Joseph Stalin)直接晤談，或由王世杰以外交部長的身分到莫斯科協商。王世杰則認為「問題的癥結在蘇俄與中共的關係，此事更不便成立任何正式的協定。」王世杰進一步表示，相關的問題要從利害上切實考慮，如果中國繼續陷入戰爭，「一切建國之業勢將無期的擱置，前途不堪設想。假使我政府對中共作重大讓步，求取和平，在假統一之形式下，暫取分疆而治之策，……危險程度似尚較小。」蔣介石於是決定先派蔣經國為私人代表赴莫斯科見史達林。

由於東北原本並非中共的勢力範圍，王世杰認為國軍接收的受阻，實際上是受到蘇聯軍隊暗地裡的干擾與縱容中共軍事行動所造成。11月13日下午6時王世杰約蘇聯大使彼得洛夫(Apollon K. Petrov)，就東北局勢表示不滿：「長春現尚為蘇軍佔領區域，昨日已有二千中共軍入城並集中於長春郊外之飛機場。中國政府由海口派軍入東三省既被中共阻於各海口；由飛機運兵至長春之事現亦無法實現，故中國政府不能不對東北接收整個問題，重新考慮。」¹⁹

面對東北接收的困境，蔣介石密集與幕僚商議，決定以退為進，迫使蘇聯對東北問題表態。14日在官邸的討論，王世杰雖仍主張「避免與蘇聯破裂，否則數月之內，東三省內將有以日本武裝為裝備之中共軍數十萬出現與我作戰。」但國民政府最後仍決定「將長春之東北行營及派赴東北接收人員一律撤退至山海關，只留一軍事代表董彥平在東北蘇軍司令部為聯絡員。」15日晚間正式將遷移東北行營及隨員至山海關的決定，以外交照會送交蘇聯大使，同時告知美國駐華代辦及駐外的主要使節。17日蘇聯方面迅速回應，將

¹⁸ 《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台北：傳記文學，1998)，「1945年11月13日記事」，頁509-510。

¹⁹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13日記事」，頁214。



照會送交王世杰，表示長春、瀋陽飛機場可供國軍運軍，蘇聯未曾支援中共軍隊，蘇軍將延期 1、2 月，以協助國軍接收。²⁰

11 月 18 日國民政府面對蘇聯延緩撤軍的訴求，決定擬一新的接收東北辦法作為交換，但軍事委員會也同時擬訂由山海關進攻錦州的計畫，東北的衝突並未得到緩解。²¹而隨著國共衝突愈演愈烈，20 日魏德邁表示美軍不再為國軍運輸六個軍到平津地區，蔣介石對此甚為著急。為能順利進行軍事調度，國軍一面持續和美軍交涉運兵船舶，一面由北寧推進到錦州及葫蘆島。²²

唐縱認為「蘇聯由於對美之鬥爭，故採取扶助中共以牽制中國政府，削弱中國政府之力量以減輕英美在遠東對蘇聯之壓力，故東北將為蘇聯遠東政策之犧牲品。」²³在蘇聯回覆後，蔣介石利用週日連續約談各軍事將領及幕僚，繼續研議東北問題及對蘇的政策。王世杰向蔣介石建議「重定接收東北辦法送交蘇聯，如彼同意，則我亦同意蘇軍之撤退延期一月，即延至明年一月三日。」²⁴儘管王世杰試圖用交換議題的手法來促成東北接收，蘇聯也表示可將軍隊暫緩撤退以待國軍的到達，但卻也趁機以履行承認外蒙獨立的問題來向國民政府施壓。²⁵

面對蘇聯阻礙國軍接收東北和施壓國民政府承認外蒙獨立，孫科認為國民政府可考慮「親蘇和共」，王世杰則認為「中蘇關係與中共問題分不開，……對蘇須避免公開破臉，對中共不妨於形式的統一之下，暫擇分疆而治之政策；待國際形勢有好轉或變化再定進一步協調或其他政策。」不過王世杰也認為他所提出的主張，最大的阻力是蘇聯日趨強硬的「高壓政策」，使得中共氣焰受鼓舞而日益囂張。王世杰認為東北問題的解決仍需美國的協助，決定請蔣介石將東北的局勢告知美國總統杜魯門，並希望美國能和國民政府能

²⁰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14、15、17日記事」，頁215-216。

²¹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18日記事」，頁216-217。

²² 《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1945年11月20、25日記事」，頁512-513。

²³ 《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1945年11月17日上星期反省錄」，頁511。

²⁴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18日記事」，頁216-217。

²⁵ 《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1945年11月20日記事」，頁512。和《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20日記事」，頁217。



協調進一步的政策和行動。²⁶

11月24日蘇聯大使館向國民政府提出答覆照會，保證國軍「運軍之飛機在長春、瀋陽無阻礙的降落。」並表示在瀋陽以南的蘇聯軍隊均已撤退，故在該區域內不能給予國軍協助。但國軍如有其他需要協助的事項，可由國民政府代表與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商討。隔天中午蔣介石與王世杰商議回覆蘇聯照會事宜，決定採取兩路並進，「一面將軍隊自山海關向錦州推進，一面擬照會蘇聯，以空軍運兵至長春、瀋陽。」²⁷

由於東北接收遲遲未有進展，東北淪為外蒙古第二的疑慮逐漸彌漫，主持外交工作和蘇聯交涉的王世杰，在輿論和政壇上都受到相當的質疑。26日上午王世杰在國防最高委員會報告東北接收困難情形，「主張一面堅持條約的立場，即認東北之主權屬於中國，蘇聯必須撤兵，且負有給我政府以道義的、物資的援助之義務。一面繼續交涉，繼續準備接收。」下午王世杰以書面向蘇聯大使提出照會，並口頭說明「即派代表蔣經國、張公權(嘉璈)赴長春詳商辦法。」²⁸

相對於國民政府希望早日接收東北，蘇聯對於如何在東北獲取更大的利益似乎更感興趣。28日張嘉璈及蔣經國和蘇聯交涉後，表示「關於經濟合作似不可不遷就。」王世杰則不認同並極力主張「在東北接收問題未有成就前，不可成立中蘇經濟合作之協定。」²⁹

然而蘇聯為了擴大在東北的利益，自11月下旬即希望中蘇雙方能就東北的經濟合作展開商談，因而對國府釋出較大的善意，對於國府提出的要求：「解除非政府軍隊之裝備及派員赴東北各省市組織警察以及沿北寧鐵路向瀋陽推進，均表同意。」蘇聯並且希望將撤兵期展至1月底，以便國軍能如期接收各地。面對蘇聯的訴求，王世杰向蔣介石建議，「撤兵延期一事不妨接受，惟須

²⁶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21、23日記事」，頁217-219。

²⁷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24-25日記事」，頁219-220。

²⁸ 王世杰在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報告過程中，居正(居覺生)大表不滿，並妨礙王世杰的發言。參見《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26-27日記事」，頁220-222。

²⁹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28日記事」，頁222。



遲至本月底再正式協定；經濟合作之商談仍宜主張遲至東北接收完竣以後。」³⁰爲了遏止蘇聯不斷在中國東北擴大利益，魏德邁甚至曾向美國政府建議，將東北各省交由中蘇美英法五強共管。³¹

蘇聯一方面釋出善意，一方面也施壓於國民政府，這使得在對蘇關係的處理上更形複雜。由於蘇聯繼續強佔東北，未履行撤兵的約定，國府對於是否繼續遵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即承認外蒙獨立，曾有詳細討論，在考慮主客觀因素後，孫科、張厲生、吳鐵城、陳布雷和王世杰等大都認爲，「外蒙之承認不可延擱，以示我方之守約。」爲了不給蘇聯在承認外蒙獨立問題上有所藉口，並且將蘇聯勢力逐出內蒙，王世杰在12月10日的中常會表示：「明年一月十五日承認外蒙之獨立，同時由外交部表示，外蒙在內蒙之軍隊當於期前撤退。」³²

12月中旬以後，國民政府開始準備歡迎美國特使馬歇爾的到來。在馬歇爾到中國與蔣介石會面之前，張嘉璈和蔣經國特地由長春飛到南京向蔣介石報告東北接收及蘇聯要求合辦重工業情形。王世杰爲了避免蘇聯得寸進尺，仍力主「對蘇之經濟合作，必須在東北接收完成後，始能有所協議。」張嘉璈則要求「先由經濟部派人往東北與之談商」，希望能突破中蘇在東北的僵局。³³

在迎接馬歇爾到中國之後，蔣介石和王世杰又飛回重慶，著手安排蔣經國赴蘇聯的事情，在12月24日王世杰擬妥給蔣經國的指示，規定其「任務在疏通感情，減少蘇聯對國民黨之疑慮，不作具體談判，對於中共問題說明蔣先生之政策與態度。」³⁴

綜觀此時期的東北局勢，對國民政府而言，收回東北在面子上可宣示主

³⁰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2月6日記事」，頁226。

³¹ 《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1945年12月4日記事」，頁516。

³²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2月2、10日記事」，頁224、228-229。在王世杰的建議下，國民政府於1947年1月5日公告承認外蒙的獨立，參閱《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2月26日、1946年1月5日記事」，頁235、242。

³³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2月22日記事」，頁233-234。

³⁴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2月23、24日記事」，頁234。



權，在裏子上可接收日本留下的大批物資與豐富的天然資源。但就美國來看，一方面想維持在中國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不願因此和蘇聯或中共有直接的摩擦，因此只願提供國民政府有限度的協助。反觀蘇聯挾其在軍事上的優勢，一邊在中國汲取利益，一邊培植親蘇的勢力，暗助中共在東北發展，使得國共雙方在東北的衝突愈演愈烈。

(二) 戰後接收初期國共交涉的過程

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正式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並於12日正式公布。但距離雙方握手簽字不到一週的時間，「中共軍隊近日破壞各處鐵路交通甚力，情勢轉惡。」³⁵周恩來也認為重慶會談後，「國民政府由和偏戰，談判陷入僵持階段，但中間也有起伏。」³⁶而且因國軍調兵北進，計畫在東北登陸，故拖延至10月20日雙方才續開談判。

20日國共雙方分別由張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周恩來、王若飛就政治協商會議等議題進行商談，原本雙方同意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名額除蔣介石擔任主席外，訂為36席，由國、共、其他黨派和無黨派平均分配。但由於青年黨欲安排6席，而中共陣營認為青年黨的政治立場較偏向國民黨，在代表名額的問題上，雙方又繼續討價還價。國共雙方除了在談判桌的較勁外，隨著國軍在各地展開接收工作，和中共的衝突也與日俱增。當天中共中央從延安電告周恩來要其表達對國軍行動的不滿，並對周指示，如國軍不停止，「對政治會議無甚興趣，葉劍英出來也無可談。偽軍、受降、解放區三問題不解決，縮軍、國大均談不上。」³⁷

當21日當國共雙方再次交涉時，雙方就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問題繼續討論。但周恩來另起話題，呼籲國軍「停止進兵、重劃受降區、恢復交通、解

³⁵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0月17日記事」，頁195。

³⁶ 周恩來，〈關於國共談判〉，輯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員會編，《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論文選》（北京：中央文獻，1996），頁1。

³⁷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5年10月20日（北京：中央文獻，1998修訂本），頁639。



散偽軍四者互相關聯，必須先解決，辦法是承認各邊區政府。」³⁸王世杰則認為「周等謂國共軍隊之大衝突一觸即發，應請政府停止『進兵』。」但事實上中共已對山西閻錫山大加攻擊，中共陣營對國軍的抗議，只是談判桌上的漫天要價。³⁹經過幾番折衝，當日雙方確定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名額分別為：國民黨 8 人，共產黨 7 人，民主同盟 9 人，青年黨 5 人，無黨派 9 人。

在政治協商會議各黨派代表名額商定後，國共雙方討論的焦點又回到戰後接收及衍生的衝突問題上。10 月 22 日中共陣營提出：「(一)、規定雙方停止攻擊，各守原防不動；(二)、規定受降區，各自執行，不得相犯。」23 日中共陣營對國軍的行動再次提出不滿，認為「現在國民黨軍進兵，使衝突無法避免。」把軍事衝突歸罪於國府陣營。⁴⁰26 日國府陣營提出避免衝突恢復交通辦法：

(一)、鐵路交通必須恢復；(二)、中共軍隊撤退到鐵路線以外；(三)、

葉劍英早日來渝出席軍事小組會議，商談中共軍隊整編及駐地問題。⁴¹

國共雙方開始集中力量商談解決軍事衝突問題，王世杰、張群續向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等提議，「只要中共不阻擾鐵路交通，則在交通線以外之中共佔領區域可暫維持現狀，一面另商根本解決辦法。」周恩來等人允諾會向中共中央請示。⁴²

10 月 30 日中共陣營針對前次國府陣營的提案，提出 4 點主張回覆：

(一)、為避免內戰，恢復交通，立即停止進兵、進攻、進佔；停止利用敵偽；在八條鐵路線(平綏、同蒲、正太、平漢北段、隴海東段、津浦、膠濟、北寧西段)上雙方都不駐兵；政府方面如向北平、天津、青島運兵須經過協商。(二)、軍事小組只能在上述問題有原則決定後才可擬定具體

³⁸ 《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5年10月20日，頁639。

³⁹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0月21日記事」，頁198。

⁴⁰ 《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5年10月22-23日，頁640。

⁴¹ 《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5年10月26日，頁640。

⁴²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0月27日記事」，頁201-202。



辦法。(三)、如不能事先取得協議，中共方面不反對先開政治協商會議，但開會時必須先解決避免內戰、恢復交通問題。(四)、周恩來回延安前須向政府問明關於國民大會的意見。⁴³

31日國府陣營對周恩來的提議予以回覆，但迴避軍隊調度問題，並另提「由路局警察維持鐵路秩序」，回應中共陣營「雙方都不駐兵」的主張。⁴⁴10月下旬王世杰和周恩來等人連日商談，此階段談判國府陣營訴求的主題為：「(一)、政治協商會議名額與人選問題(已商定)，(二)、恢復交通避免衝突辦法。」⁴⁵但中共佔領地區(解放區)的問題，雙方仍未獲共識，同意留待政治協商會議繼續討論。在最敏感的軍事衝突問題上，雖然國共雙方都認為亟待解決，卻遲遲難以達成協議。⁴⁶

在此番國共重回談判桌後，雙方的摩擦並未減少，反而隨著戰後接收與復員工作的展開，爲了爭取有利的戰略位置和資源而不時發生衝突，特別是在華北和東北地區尤爲激烈。唐縱對當時中共的軍力與動向評估後，對局勢發展並不樂觀：

華北中共問題日來更形緊張，中共於晉南約有十餘萬人，山東十餘萬人，綏察數萬人，蘇北數萬人，東北數萬人，向歸綏、大同、太原攻擊，平津亦被包圍威脅。中共目前企圖：(一)集中軍隊；(二)破壞交通；(三)控制佔領區。⁴⁷

由於中共的行動與國民政府企圖恢復交通，以俾迅速調動軍隊接收的目標相左，王世杰對局勢甚感擔憂，加上「中共軍隊集中於綏遠方面者聞有十

⁴³ 《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5年10月30日，頁640-641。

⁴⁴ 《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5年10月31日，頁641。

⁴⁵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0月24日記事」，頁200。

⁴⁶ 周恩來，〈關於國共談判〉，頁1。

⁴⁷ 《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1945年11月3日上星期反省錄」，頁505。毛澤東在當時指出，中共在華北、華中、東北、陝甘寧邊區共有1億5千萬人口，130萬軍隊，250萬以上的民兵。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5年10月25日(北京：中央文獻，2002)，頁41。



萬之眾，傅作義軍隊少，大受威脅。內戰之危險甚大，予仍主張極力避免。」⁴⁸然而「近日中共軍隊向綏遠方面集中，威脅傅作義所部隊伍。中央不得已，派空軍赴包頭以備萬一。」在國軍準備動用空軍後，王世杰和張群向蔣介石提議，「與中共訂一暫時避免衝突辦法。蓋內戰一發，勢將不可遏止」，中共可能藉此機會，在蘇聯的奧援下進一步擴張勢力，並「奪佔熱察綏甚或東北三省，而自成一國。」蔣介石在評估後亦同意王世杰等人的看法，同意其與中共商談避免軍事衝突的辦法。⁴⁹

王世杰等人在獲得蔣介石的同意後，在 11 月 1 日下午和周恩來等繼續商談「避免內戰恢復鐵路交通辦法」。周恩來堅持在各鐵路線，中共及政府均不駐兵。⁵⁰周恩來判斷此時國軍因在華北受阻，急於進軍接收東北，所以願意談停止進攻。⁵¹

2 日下午，王世杰、張群、邵力子與周恩來、王若飛續談停止軍事行動辦法，王世杰認為「周等顯無息兵之誠意，中共之目的顯於蘇軍自東三省撤退前，進佔熱察綏及東北之大部區域。形勢之嚴重，實屬空前。蘇聯暗中似亦在鼓勵，因東北共產黨之活動顯示受其扶植，政府派赴長春人員則大受蘇軍之壓制。」⁵²

3 日晚間王世杰與蔣介石討論中共問題，蔣介石對黃河以北地區的接收亦不甚樂觀。王世杰表示「中共問題與蘇聯問題不可分開；今後蘇聯是將採取與美英合作路線，抑背道而馳，不久當見分曉；在此一問題未決前，政府對於中共問題，只可儘力防範其擾亂之範圍，不能希望得到根本解決。」⁵³

隨著談判的進度陷入膠著，國共的軍事對峙更為嚴峻，8 日中共陣營又

⁴⁸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0月26日記事」，頁201。

⁴⁹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0月31日記事」，頁203-204。

⁵⁰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1日記事」，頁205。

⁵¹ 在國府陣營提出派交通考察團的方案後，中共陣營又提出一方案：「(一)、停攻須全面；(二)、撤出鐵路線須雙方；(三)、北寧西段、津浦南段必在內；(四)、停止利用敵偽須確定。」參閱周恩來，〈關於國共談判〉，頁1-2。

⁵²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2日記事」，頁206-207。

⁵³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3日記事」，頁207。



提出新方案：「(一)、全面停攻；(二)、退出侵占區；(三)、雙方退出鐵路線；(四)、保證以後不攻，並取消『清剿』命令。」不過國府陣營爲了早日接收東北，並未回應中共陣營的新提案，張群欲就國軍進入東北的軍隊數目和周恩來等協商，中共陣營則又另提民主自治的議題，雙方均對對方的提議顧左右而言他，國軍運兵一事當然也就未能在談判桌上得到共識。⁵⁴

爲了探求史達林對華政策的意圖，蔣介石決定派蔣經國以私人代表的身分赴蘇聯與史達林商談。11月10日下午王世杰與周恩來、王若飛繼續談論停止戰爭事宜，王世杰提議「雙方先下令停止進攻。」周恩來則未贊成，表示「須中央軍先行退返原防，交回其所謂『進佔』地區。」⁵⁵11日民主同盟主席張瀾出面邀集國共雙方談判代表，商談如何停止內戰。張瀾主張立即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王世杰表示贊同，但周恩來則表示尙需向延安請示，未正面回應張瀾的訴求。⁵⁶

15日下午5時起，國共雙方繼續商談，由於離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時間日愈迫近，張群一開場就先問：「已否接到延安電報？」周恩來表示延安方面已贊成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但爲安排出席名單「擬回延安一次，代表名單約二十日左右可確定。」⁵⁷張群爲了能持續維持雙方溝通的管道，接著表示：「不論目前有任何困難即使打仗我們的『會談』仍須繼續進行；……將來政治協商會開會，我們也仍然可以繼續商談。」⁵⁸

爲了使政治協商會議能順遂舉行，確實解決戰後中國制度重建的問題，王世杰希望：「毛先生能來重慶與蔣先生負責共同進行。……吾人應盡力緩

⁵⁴ 周恩來，〈關於國共談判〉，頁2。當日中共中央電告周恩來，認爲「目前的談判，彼方全爲緩兵之計」，要周在談判上「不束縛手足」，保留伸縮餘地。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5年11月8日，頁641-642。

⁵⁵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9、10日記事」，頁212-213。

⁵⁶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11日記事」，頁213。

⁵⁷ 15日的談判由國民政府代表張群、邵力子、王世杰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王若飛進行交涉。〈政府代表與中共會談紀錄〉，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80104-015卷002-08014-015-006-001x。原會談紀錄無標點符號，引文時加註標點以便閱讀。

⁵⁸ 〈政府代表與中共會談紀錄〉，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80104-015卷002-08014-015-006-002x。



和一般空氣：1、應下令暫時不打 2、應暫時不罵。」並提議雙方「應以『政績競賽』代替政治摩擦，以能力信仰維持統一，此後彼此應各就原崗位充分表現工作成績，不相妨礙。」周恩來則回應：「若長期合作必須有具體辦法，其先決條件又須重提『施政綱領』問題，在憲法未公布前，應協商如何起草如何公布綱領，全國民選也應在協商之內，倘能在憲法公布以前草訂共同方案，非但可以停止內戰亦可達到長久合作之目的。」⁵⁹

由於國共為爭取接收東北導致衝突不斷，張群轉而探詢中共是否擬向東北發展？周恩來則虛應：「東北過去未經過(國民)黨治。」並表示「衝突之原因在解放區問題未能解決所致，現時的衝突實係自衛東北問題，……吾人甚希望能以東北為民主平等實驗區。」⁶⁰周恩來亦表示反對美軍協助國民政府接收或駐軍，認為美軍提供給國軍裝備是「要以武器幫助國民黨打內戰」。⁶¹

17日雙方談判的主軸仍在謀求東北問題的解決，周恩來提出「讓東北發展成為平等、民主與和平的模範區；要求停止在北寧線上運兵」，並反對請赫爾利繼續斡旋等。⁶²事實上此時中共正要全力進攻歸綏，加上蘇聯表示撤兵前五天始能運兵，國軍在東北處於不利的局面，所以中共並不願收兵止戰。張群則希望周恩來能向毛澤東詳盡的轉達國府陣營的意見，尋求解決「解放區」和軍隊駐軍的問題，並希望把省的問題留待政治協商會議後解決。⁶³在18日以後，由於周恩來要候機返回延安，國共雙方的談判爭端仍是懸而未決。⁶⁴

⁵⁹ 〈政府代表與中共會談紀錄〉，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80104-015卷002-080104-015-006-006x。

⁶⁰ 〈政府代表與中共會談紀錄〉，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80104-015卷002-080104-015-006-006x。

⁶¹ 《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5年11月15日，頁642。

⁶² 17日的談判由國民政府代表張群、邵力子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王若飛進行交涉。〈政府代表與中共會談紀錄〉，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80104-015卷002-080104-015-006-008x。《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5年11月17日，頁642。

⁶³ 〈政府代表與中共會談紀錄〉，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80104-015卷002-080104-015-006-010x。

⁶⁴ 周恩來要到11月25日才飛返延安。周恩來，〈關於國共談判〉，頁2。



(三) 中共在戰後接收初期的談判策略

中共在此階段以周恩來為主談代表，其看法相當程度的反映出中共陣營的主張。周恩來認為國共雙方問題的解決，主要「繫於美蘇關係和力量的對比」，因此如何在美蘇間爭取支持，成為中共陣營在和國府陣營周旋時，所必須考量的重點。⁶⁵

對於當時美國的對華政策，周恩來認為美國在「抗戰時是扶蔣用共；戰後是扶蔣壓共」，美國派赫爾利、馬歇爾先後到中國，其目的在「支持中國統一，好便於美國取得優勢或獨霸」。因此，周恩來對美的態度是「力求在某種程度上中立它，不挑畔；……對其錯誤政策必給以適當批評；對其武裝干涉中國內政必給以嚴正抗議；對其武裝進攻給以堅決抵抗。」⁶⁶

至於蘇聯的對華政策，周恩來認為因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限制，蘇聯只能暗助中共，他認為蘇聯「沒有不願意援助中國人民和支持中共談判的。只是這種援助必然是不公開的，這種支持必然是暗示式的。」⁶⁷周恩來判斷蘇聯當時不願在東北有軍事糾紛，絕不願美國軍隊進入東北，也不願讓國軍派太多兵力駐紮，以保有在東北的主導優勢。

至於對當時的社會局勢，周恩來評估重慶會談後「人心厭亂、兵心厭戰」，在中國社會上已營造出對國共合作的期待和氣氛，「反內戰求和平」成為當時最得人心的口號。但周恩來也認為「要蔣放棄反共思想和滅共企圖而自動地做到國共親密合作，這是不可能的；但要蔣目前下討伐決心，寧進行長期內戰而不惜，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國共關係會在和戰間搖擺不定，並且「停戰以後，談判不成，又會打起來的，……邊打邊談會成為今後相當時間的國共關係的特點」。周恩來因此主張「和平方針是矛，堅強抵抗是盾。戰而遇到抵抗，使其知難而退，才會走向和。」而「既稱和，便須有妥協，有妥協便須有價錢，……要有一個基本價錢，好在有利時機，使妥協能夠得

⁶⁵ 周恩來，〈關於國共談判〉，頁3。

⁶⁶ 周恩來，〈關於國共談判〉，頁5-6。

⁶⁷ 周恩來，〈關於國共談判〉，頁6-7。



到。」此外由於國府陣營內部派系複雜，周恩來分析「蔣在和戰之間的搖擺，目前是偏於戰，因之利用美國的支援、CC 的叫囂和黃埔的兵力，決心將我們趕出鐵路線以外，但同時卻又運用政學、英美及元老三系份子與我們進行不疲倦的談判。」⁶⁸

綜觀此階段中共的談判策略在「以戰促和」，其作法是在軍事上「以戰養軍」，藉由武力擴大佔領區，積極接收戰略物資，再以取得的資源進一步擴軍，並透過既有的軍事影響力和佔有地盤的事實，以談判的方式爭取和國民黨平起平坐的機會，塑造國共對等的印象與事實。而其談判方針為「本著反內戰、爭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針，實行政治進攻、軍事自衛的原則，確定雙十會談紀要我方提案為基本價錢，來進行『邊談邊打』的談判。」⁶⁹明確訂出其談判底線，並靠掌握軍權和地方政權的事實，在談判桌上據以力爭更有利的條件。

至於在談判技巧方面，本時期的中共在蘇聯的暗助下，逐步將軍力向東北集結，以擴張佔領地區和爭取接收日本留下的物資，其關注的議題主要是讓「國軍停止進兵」和處理「偽軍、受降、解放區」等資源分配的問題，對於當時談判桌上討論的政治協商會議議題，反而不是其急於解決的問題。因此中共陣營一方面採取「一籃子議題」的方式把「國軍停止進兵、重劃受降區、恢復交通、解散偽軍」四個議題串聯在一起，要國府陣營先解決。⁷⁰一方面把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議題當成籌碼，用來要求國府陣營讓步。

其次中共陣營為了保有既得利益，也提出「分疆而治」的構想。⁷¹中共此一劃地分治的想法也曾影響王世杰，當時王世杰為了不和蘇聯公開決裂，以免蘇聯支持中共「自成一國」，也曾考慮「在形式統一之下，暫擇分疆而

⁶⁸ 周恩來，〈關於國共談判〉，頁3-4、7-8。此外唐縱曾主張「軍事加緊，政治讓步，以軍事的力量衡量讓步的標準」；如不能在軍事上佔優勢，對中共仍宜以政治解決，但該主張並未獲得國民黨內的支持。參見《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1945年11月3日記事及上星期反省錄」，頁506-507。

⁶⁹ 周恩來，〈關於國共談判〉，頁13。

⁷⁰ 《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5年10月20日，頁639。

⁷¹ 《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5年10月22日，頁640。



治之政策」，惟未獲國府陣營內部的支持。⁷²有關此時期中共的談判主張，彙整如表 2：

表2、中共在戰後接收初期的談判主張

主要議題	中共談判主張
談判方針	反內戰、爭民主、求和平。
談判原則	政治進攻、軍事自衛、以重慶會談中共提案為底限。
政治攻勢	以政治協商會議為主，輔之以國共幕後商談。
停止內戰	1.停攻、停佔、停進；2.停止利用敵偽；3.雙方撤離鐵路線；4.運兵須協商。
東北問題	1.東北應實行民選，由鄉到省，成立地方性的聯合政府；2.長春鐵路線，應容許雙方駐兵；3.人民自衛武裝，應歸各地民選政府管轄整編；4.東北經濟建設，應由民主聯合機構管理，保證不使用於內戰。
施政綱領與改組政府	1.民主施政綱領；2.取消黨治；3.聯合政府。
國民大會	1.國大代表重選；2.憲草原則；3.區別制憲國大和行憲國大。
中共佔領區(解放區)及軍隊	1.內戰不能真正停止，全國軍隊不能整編，解放區軍隊縮編，自也無從談起； 2.對解放區不再單獨提案，改提地方自治，省得自訂省憲，自舉省長及省級政府。
重慶會談紀要	已得雙方同意的事項，應即付之實施，如人民自由、釋放政治犯、黨派合法、廢除特務機關、地方自治、嚴懲漢奸、解散偽軍等項，應由政治協商會議加以督促。

資料來源：周恩來，〈關於國共談判〉，輯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員會編，《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1996)，頁13-16。

四、馬歇爾使華與國共「第一次停戰協議」

(一) 馬歇爾使華任務

在 11 月下旬國民政府蔣介石主席致電美國杜魯門總統不久後，美國傳出駐華大使赫爾利辭職，改派馬歇爾將軍為特使赴華，王世杰認為這是美國要協助國民政府處理東北問題的佈局。⁷³事實上杜魯門要馬歇爾出任新職後，為了讓他能有效的執行美國對華政策，杜魯門即令白宮參謀長李海將軍

⁷²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0月31日、11月23日記事」，頁203-204、218-219。

⁷³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21、29日記事」，頁218、222。邵宗海的研究認為美國派馬歇爾使華係因：(一)、恐懼蘇聯在太平洋擴張勢力；(二)、恐懼日軍再復起；(三)、以有效壓制國民政府的策略，解決和平統一中國的問題；(四)、美國避免直接受到中國內爭的牽累。參見邵宗海，《美國介入國共和談之角色》(台北：五南，1995)，頁222。



(William D. Leahy)草擬使華訓令，並在馬歇爾赴中國前交付三份訓令，包括：「杜魯門總統致馬歇爾特使函、美國對華政策全文和國務卿致陸軍部長函」，要馬歇爾以特使身分，「以適當而現實之態度，運用美國之影響力」，協助中國能依和平民主之方法，及早實現統一。並明確告知蔣介石等中國領導人：「一個分裂而經過內爭摧殘之中國，將不能成爲美國考慮援助之實際對象。」⁷⁴

12月15日杜魯門在馬歇爾啓程前發表對華政策，杜魯門首先要中國迅速依照和平協商的方法調整內部爭議，特別是下列兩點至關重要：

- (一)、國民政府、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見不合之軍隊，應協商停止敵對行動，俾中國全境得以重歸中國之有效控制，日本軍隊亦得迅速撤退。
- (二)、召開一全國主要政黨代表會議，以謀早日解決目前之內爭，俾中國統一得告實現。⁷⁵

杜魯門試圖以此聲明確認國民政府在中國的合法性與代表性；期待將代議制度推廣至中國，以擴大國民政府的基礎和解決中共的武裝力量；並且以駐華美軍和經濟援華做爲籌碼。

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宣告，國民政府也加緊做好迎接馬歇爾的準備。爲了讓馬歇爾對中共問題與中蘇關係有所瞭解，蔣介石要陳布雷準備提供一書面報告，並決定要在南京接見馬歇爾，因此吩咐王世杰到南京安排相關事宜。⁷⁶

20日馬歇爾飛抵上海江灣機場，次日晚上蔣介石在其中央軍校寓所宴請馬歇爾，馬歇爾在餐後表示「杜魯門願予中國戰後復興之一切援助，惟需於美國輿論贊援之情形下爲之。」⁷⁷

22日馬歇爾抵達重慶，隔日和周恩來進行首次會晤，周恩來對杜魯門的

⁷⁴ 梁敬鐸，〈馬歇爾使華訓令之草擬與會商〉，輯於《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後中國(三)(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50-58。

⁷⁵ 〈杜魯門總統關於美國對中國政策之聲明〉，輯於《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後中國(三)，頁48-50。

⁷⁶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2月13、18日記事」，頁230、232。

⁷⁷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2月21日記事」，頁233。



對華政策聲明表示歡迎，並對其中的主要論點予以肯定，包括：(一)、中國不能內戰；(二)、民主政治；(三)、主張現在成立一個臨時性的民主聯合政府。周恩來還特別強調：「我們一向是主張軍隊國家化的，但這個國家必須是一個有憲法的國家，中國現尚無憲法。」⁷⁸將中共保有軍隊的問題，技巧性的轉移到中國憲政制度不完備上。馬歇爾到了重慶以後，就積極的和朝野各方人士會晤，正式展開他在中國的調處任務。

(二)馬歇爾調處與國共「第一次停戰協議」

在馬歇爾準備起程前往中國的同時，國民政府於12月15日派飛機至延安，並在隔天把周恩來、葉劍英、吳玉章、鄧穎超和陸定一等人接到重慶，準備參加政治協商會議。15日當晚國府陣營的孫科、陳布雷、邵力子和王世杰在吳鐵城家中商談對策，王世杰主張「本黨此次下大決心，作一妥協之嚐試。」⁷⁹

周恩來到重慶之後，在18日召開中外記者會，展開其政治宣傳攻勢。周恩來表示此次到重慶，一方面準備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一方面要繼續進行國共談判。周主張政治協商會議首待解決的是停止內戰，其次是要討論出和平建國方案，此完全依其先前的談判規劃逐一遂行。⁸⁰

在馬歇爾抵達重慶後，先後和國共雙方的談判代表接觸，以瞭解雙方的想法，並催促雙方儘快繼續商談。27日在國共恢復談判前，周恩來先拜會馬歇爾，並提議「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前應先召集一個包括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籌備會議，由這個會議決定正式會議的日期，以及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⁷⁸ 周恩來，〈歡迎馬歇爾來華促進中國和平〉，《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頁22-24。

⁷⁹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2月15日記事」，頁230-231。

⁸⁰ 周恩來，〈協商解決關係中國民族前途的重要問題〉，《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頁17。周恩來表示要商談的問題包括：停止內戰；和平建國方案(共同綱領、政府改組、復員善後等)；國民大會；解放區和軍隊國家化等。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5年12月18日，頁646。



並將其「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等談判主張向馬歇爾先說明。⁸¹當日王世杰、張群、邵力子和周恩來、葉劍英、王若飛等恢復商談停止軍事衝突事宜時，周恩來即提出無條件停戰，中共陣營的主張為：

(一)、雙方下令所屬部隊暫駐原地，停止一切軍事衝突；(二)、凡與避免內戰有關的一切問題如受降、解除敵軍武裝、解散偽軍、恢復交通及解放區、收復區等，在軍事衝突停止後用和平協商方法解決；(三)、為保證實現上述兩項，在政協會議指導下，組織全國各界考察團分赴有內戰的各地區考察，隨時報告事實真相，公諸國人。⁸²

王世杰認為這是因為中共在當時軍事陷入不利局面，因而在談判態度上轉趨溫和。28日王世杰和張群趁勢建議蔣介石能同意停止軍事衝突及恢復交通的提議。⁸³

30日晚上王世杰與馬歇爾詳談中共問題時，馬歇爾表示「願參加國共停戰辦法之商討，希望我(國民)政府能提出三人小組(國共各1人、美方1人)討論停戰及恢復交通等涉及受降義務之事項。」王世杰則擔心三人小組的提議，可能引起蘇聯的抗議或加入，將使得問題更為複雜。⁸⁴

12月31日蔣介石宣布於翌年1月10日舉行政治協商會議。下午王世杰和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王若飛晤談，將馬歇爾的提議及「停止軍事衝突辦法三項」提出，以回覆中共27日的訴求：

(一)、停止國內各地一切軍事衝突，並恢復鐵路交通；(二)、因國內軍事衝突及交通阻塞等事，與我國對盟邦所負有之受降及遣送敵俘等義務有關，所有與停止軍事衝突恢復鐵路交通及其他與受降有關事項，由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會同馬歇爾將軍，從速商定辦法，提請政府實施。(三)由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會推定公正人士五人，

⁸¹ 周恩來，〈應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頁25-26。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等人，也於12月底致函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

⁸² 《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5年11月27日記事，頁648。

⁸³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2月28日記事」，頁236。

⁸⁴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2月30日記事」，頁237-238。



組織軍事考察團，分赴各發生衝突區域，考察軍事狀況交通情形，以及其他與國內和平恢復有關事項，隨時將事實真相，提出報告公布。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時，亦請推定公正人士參加。⁸⁵

1946年元旦馬歇爾派代辦拜訪王世杰，詢問中共的反應。王世杰認為因「中共軍事迭受挫折，國軍又正向熱河前進，彼等需要停戰甚迫也。」所以判斷中共應不至於反對馬歇爾參加國共停戰的商談。⁸⁶當天馬歇爾和周恩來會面時，馬歇爾即建議由國、共和美國三方各派1人組成委員會，共同處理有關停戰、恢復交通和受降事宜。但周恩來以「中共歡迎外來的友誼，但也希望盟國恪守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諾言。」來迴避馬歇爾的提議。⁸⁷2日馬歇爾分別向蔣介石和周恩來提出「國共雙方停止軍事衝突令稿」，以具體的書面協議內容，提供雙方就停止戰爭行動和成立執行總部等議題，進行仔細的考量。⁸⁸

1月3日周恩來和馬歇爾碰面時，一改日前不願美國介入的態度，歡迎馬歇爾斡旋國共的爭議。⁸⁹下午王世杰和周恩來等商談，周恩來即表示「已得延安回示，對於政府停戰之答覆案，大體可接受」，並希望馬上全面停戰。王世杰認為「對於中共問題應以求得初步的政治解決，停止軍事衝突為善。像國軍現時雖佔優勢，不久或可佔取承德(熱河)，然國際形勢實不容武力解決。東北之收回尚未完成，近日經我方沉著應變，對蘇關係雖已改善，但如熱、察方面戰事擴大與延長亦難免發生其他變化。」⁹⁰

在中共陣營原則同意接受國府陣營所提的方案後，⁹¹4日晚上馬歇爾提出

⁸⁵ 張群，〈政府代表張群報告停止軍事衝突及恢復交通商談經過〉，輯於《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後中國(三)(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134-137。

⁸⁶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2月31日、1946年1月1日記事」，頁238-239。

⁸⁷ 《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6年1月1日，頁650。

⁸⁸ 〈馬歇爾特使上蔣介石主席提出國共雙方停止軍事衝突令稿之備忘錄〉，輯於《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後中國(三)，頁63-66。

⁸⁹ 《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6年1月3日，頁650。

⁹⁰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6年1月3日記事」，頁240-241。

⁹¹ 馬歇爾在4日和周恩來商談停止衝突和軍隊調動等問題，周恩來在此次和後續相關談判均同意



「國共停戰協議草案」與王世杰做了深入的討論，該草案主張「一切軍事行動停止，惟政府派兵接收滿州之行動應不受牽制。」馬歇爾並提出由「國共各推代表一人，美政府亦找一人組成推行總部，其事權限於停戰及恢復交通與受降、遣俘四事。總部之命令仍須以蔣主席之名義頒布。」王世杰認為此提議事涉廣泛，希望細節能先讓蔣介石瞭解及考慮。⁹²

5日馬歇爾分別和周恩來及蔣介石晤談，馬歇爾和周恩來就「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商議具體的條文。⁹³中午馬歇爾和蔣介石商討國共停戰協議草案，但蔣介石並未予以肯定的回應。相較於蔣介石的猶豫，王世杰樂觀的認為「美國之政策，在鞏固我政府在東北之地位；停戰協議成立後，美政府願助我運軍或以復興借款予我，較為自由。日俘遣送與受降等工作，可由停戰及恢復交通而完成。」此外，藉由美國的支持可以加強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與自身力量，所以王世杰建議蔣介石對馬歇爾的提案在略微修正後，宜迅速接受。⁹⁴

經過5日馬歇爾在國共陣營的來回斡旋，當天晚上雙方雖在停戰命令的內容上，仍有部分的爭議尚待繼續商討，⁹⁵但國共雙方就停止軍事衝突與恢復交通已在原則上達成共識，並擬定《關於停止衝突及恢復交通辦法》，其要點如下：

- (一)、停止國內各地一切軍事衝突，並恢復一切交通。關於停止衝突及恢復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條之規定商定之。
- (二)、因國內軍事衝突及交通阻塞等事，與我國對盟邦所負有之受降及遣送敵俘等義務有關，故應由政府與中共各派代表一人，會同馬歇爾將軍從速商定辦法，提請政府實施。
- (三)由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會及政治協商會議，各推定國共

國民政府將軍隊運送到滿州，並承認國民政府在滿州接收的權利。George Catlett Marshall,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pp. 14-15.

⁹²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6年1月4日記事」，頁241-242。

⁹³ 《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6年1月5日，頁651。

⁹⁴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6年1月5日記事」，頁242-244。

⁹⁵ 例如中共陣營希望將涉及東北的文句刪去，把碉堡增列為拆除對象等。參閱周恩來，〈停戰辦法中應刪去涉及東北的文句〉，《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頁33-34。



兩黨當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八人，組織軍事考察團，會同國共雙方代表分赴全國發生衝突區域考察軍事狀況、交通情形，以及其他與國內和平恢復有關事項，隨時將事實真相提出報告，並公布之。⁹⁶

此時雙方爭執的焦點主要在接收熱河的赤峰和多倫兩處，由於國民政府軍隊已迫近該區，並預估可於短期內佔領，在軍事行動上處於有利的地位，所以中共急於達成停戰協定。但由於赤峰和多倫具有戰略價值，蔣介石希望馬歇爾能先同意國民政府軍進佔，國共雙方均力爭而未能獲致最終的停戰協議。⁹⁷

1月6日蔣介石核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辦法及全體與會人員名單，並成立秘書處，由雷震擔任秘書長。⁹⁸7日，由張群、周恩來和馬歇爾組成的三人會議展開首次商談，討論「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的具體內容。周恩來表示原則上同意張群的主張，但認為「停止衝突應包括全國」；對於拆除交通障礙，「應包括影響交通的碉堡、工事都拆除；關於交通的定義，包括鐵路、公路、輪船、電報、郵政等等，即各種交通工具」；並補充「停戰令中應確定執行指令的日期」。周恩來對張群指出，中共陣營尚無法接受的只剩兩個問題：「第一個是關於東北九省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張先生剛才提到的與中蘇協議有關的那些地方。」周建議「東北九省的一切部隊的調動應經商議確定」，但仍反對把赤峰和多倫當做停戰協定的例外。⁹⁹此外周恩來還主張把「准許國民政府軍隊開入滿州」記入會議紀錄，

⁹⁶ 《停止衝突及恢復交通辦法》，輯於《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後中國(三)，頁66；《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5年1月5日，頁651。該辦法在1月10日公布時，名稱改為〈停止國內軍事衝突辦法〉，參閱《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後中國(二)，頁124。

⁹⁷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6年1月6日記事」，頁244-245。

⁹⁸ 朱匯森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46年1至3月份(台北：國史館，1989)，頁124。

⁹⁹ 周恩來，〈停戰協定把赤峰、多倫作為例外沒有根據〉，《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頁35-38。對於國軍要向赤峰和多倫推進，周恩來以「這是新的問題，故我無法答覆，無法以馬歇爾的提案作基礎來考慮。」及該議題未獲延安授權來拒絕國府陣營，參見周恩來，〈要我讓出赤峰、多倫的方案無法考慮〉，《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頁41-42。



而不寫進停戰命令，以免外界誤會中共反對此項調動。¹⁰⁰隨著國共在談判桌上的歧見逐漸縮小，停戰有達成協議的可能，當日下午政治協商會議的談話會也得以順利召開。¹⁰¹

8日上午召開第2次3人會議，完成停戰令的討論，但由於中共陣營堅持不在赤峰和多倫兩地退讓，下午召開第3次會議時，雙方先討論軍事調處執行部的組織。¹⁰²晚間王世杰向蔣介石建議，在國共停戰命令上宜有所讓步，以促成協議的達成。王世杰認為停戰之事「必須多從政治上作遠大之考慮，不可拘泥於一二城市(即赤峰、多倫)之暫時得失。」¹⁰³9日馬歇爾和周恩來會面，周先表達其難處「現政府所提的熱、察，特別是赤峰、多倫事，使我的處境極為困難。……這已是駐軍的問題，屬於政治問題，這應在整軍以後來談，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停戰。」周接著又表現出謀求協定的誠意，「停戰的條件已經一切具備，只要立即宣布，中共也願盡一切力量無保留地保其實現。……明天政治協商會議即將開幕，蔣委員長將致詞。停戰命令公布了，也能給他一個很好的基礎。」¹⁰⁴當日下午3人會議繼續進行第4回合的調處，會後張群和王世杰繼續到蔣介石官邸商議停戰命令的內容，王世杰再次建議「必要時由蔣先生對馬歇爾讓步以示寬大，且以堅中共對馬歇爾之信任。」¹⁰⁵當天晚上10馬歇爾親自拜會蔣介石，獲得國民政府對赤峰、多倫的讓步。¹⁰⁶10日上午7時，張群一早打電話告知王世杰「昨晚深夜，蔣先生已接受馬歇爾之請，於今日8時與中共成立停戰命令之協議。(赤峰、多倫兩城留待以後解決)」¹⁰⁷

10日上午三人會議繼續進行第五次會商，完成對停戰令的最後討論，由

¹⁰⁰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p. 15.

¹⁰¹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6年1月7日記事」，頁245。

¹⁰² 王成勉編，《馬歇爾使華調處日誌》，1946年1月8日(台北：國史館，1992)，頁31。

¹⁰³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6年1月8日記事」，頁246。

¹⁰⁴ 周恩來，〈首要問題是立即停戰〉，《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頁47-49。

¹⁰⁵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6年1月8、9日記事」，頁246-247。

¹⁰⁶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p. 17; 王成勉編，《馬歇爾使華調處日誌》，1946年1月9日，頁32。

¹⁰⁷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6年1月10日記事」，頁247。



張群、周恩來和馬歇爾三方簽署停止衝突命令草稿和了解事項；並在馬歇爾的見證下，由國共雙方另簽在北平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和共同聲明。¹⁰⁸國共雙方在達成停戰協議後，隨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讓中國的未來又露出一絲和平的曙光。

(三) 中共在「第一次停戰談判」中的策略

本階段的國共談判雖然是在 1945 年 12 月 27 日才恢復交涉，但事實上由於 11 月中旬國民政府「以退為進」，將東北行營自長春撤離，迫使蘇聯表態後，國軍在東北的軍事調度和接收逐漸有所進展，中共相對落居下風，因而在 12 月初即希望「再開談判並開政協會議」，並要張嘉璈轉告王世杰和邵力子，「同意就國民黨軍駐長春、瀋陽問題進行協商。」¹⁰⁹

而本時期的國共談判，依成員結構的不同，又可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分由於中共準備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已到達重慶，加上雙方要進行調解軍事衝突議題的討論，中共代表在周恩來、王若飛之外，先後又有葉劍英和董必武等人加入會談。第二部份則是自 1946 年 1 月 7 日開始，由張群、周恩來在馬歇爾的斡旋下，組成三人會議繼續商談國共停戰和恢復交通等問題。

由本階段談判的過程觀察，中共此時所採取的談判策略較為積極。周恩來在考慮即將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情形下，特別加強對媒體的政治宣傳，並訴求「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一方面爭取民意的認同，一方面緩和當時中共戰況吃緊的壓力。而為了達到停戰的訴求，周恩來在 12 月 27 日恢復談判的首次會談，就提出建議方案，可說是有備而來。

其次面對「第三者」的加入談判，當馬歇爾提出要參與國共談判的調處時，由於有赫爾利參與斡旋的失敗經驗，周恩來先是迴避「第三者」的介入，

¹⁰⁸ 張群，〈政府代表張群報告停止軍事衝突及恢復交通商談經過〉，輯於《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後中國(二)，頁134-137。1月10日下午舉行第六次三人會議，商議完成軍事調處執行部的條文，國共雙方代表並邀請馬歇爾參加軍事三人小組。參見王成勉編，《馬歇爾使華調處日誌》，1946年1月10日，頁32。

¹⁰⁹ 《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5年12月1日，頁643。



待其看到馬歇爾的書面建議，加上中共中央的同意，周恩來改採歡迎的態度來面對馬歇爾的加入。¹¹⁰

第三在談判技巧方面，當中共在軍事落居下風時，在談判桌上一方面讓步接受國府陣營的提案，但也不忘「挾帶議題」要求馬上全面停戰，或者是把恢復交通的範圍擴大到各種交通工具，以在劣勢中爭取對其較有利的狀況。

此外中共在面對其無法接受的議題時，例如國軍要接收赤峰和多倫，周恩來在態度上剛柔並濟，一方面堅決反對讓步，一方面表達其難處，並利用「切割議題」和「擱置議題」的手法，把該問題歸為政治問題，與停戰問題無關，而要求在整軍以後再談。周恩來並且藉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召開的時間壓力，要國府陣營對赤峰和多倫的問題讓步，以儘速達成協議，好讓政治協商會議有好的基礎。

最後，有關中共在此階段的談判主張，茲彙整如表 3：

表3、中共在「第一次停戰談判」的主張

主要議題	中共談判主張
政治協商會議 籌備會議	先召集一個包括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籌備會議，由這個會議決定正式會議的日期，以及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停止內戰	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並適用於全國，包括： 1.雙方下令停戰；2.有關各項問題以商談方式解決；3.組織調查團往衝突地點觀察。
鐵路問題	雙方均退出鐵路線，使鐵路中立，包括： 1.雙方退出鐵路線；2.鐵路不受軍事控制，組織由公正人士為首的交通委員會，管理一切鐵路線；3.鐵路由路警維持安全。
東北問題	1.不反對國民政府代表中國收回東北主權；2.東北不應再實行一黨專政，政治要民主；3.經濟事業應建立包括各方人士的機構，用民主方法管理，使東北資源不致用來供內戰用途。
調動軍隊	1.國民黨不能經過解放區運兵；2.國民黨不用其他方式(空海)運兵到華北。

資料來源：周恩來，〈應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輯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員會編，《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1996)，頁25-26。

¹¹⁰ 《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6年1月1、3日，頁650。



五、結語

環顧中共在重慶會談結束後到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其談判策略在這三個月期間內，伴隨著美、蘇對華政策的變化，加上國共雙方在復員與接收的實力消長，雖然一直以「以戰促和」為其策略主軸，但在談判戰術上隨之彈性因應，談判技巧也呈現豐富的面貌。

首先在談判的權力結構方面，對日抗戰結束後，由於國民政府缺乏控制中國全局的能力，隨著日軍的撤離和其扶植政權的垮臺，中國面臨舊秩序崩解、新規則亟待建立的權力混沌狀態。美國基於其自身的利益，持續在政策上支持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但卻不願讓美軍涉入國共間的紛爭，因此先後派赫爾利和馬歇爾到中國斡旋。蘇聯則藉由《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名正言順的將大軍開進中國東北，並積極在中國汲取利益和培植代理人，不過由於蘇聯在二次大戰後也尚待復元，不希望另啓戰端，因此只能暗助中共的發展。而擁有軍隊做為後盾的中共則趁勢擴張，並在「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規劃下，以「爭取蘇聯、中立美國」的作法，積極擴展在華北、東北的佔領區。¹¹¹所以此時期的中國在國共各有所圖，但也各力有未逮，無法完全以武力的手段解決對方的情形下；加上美國的介入和蘇聯為了保有戰果的考量，國共關係就在雙方談談打打中時和時戰。

其次中共談判陣營在談判的過程中，均會對當時的國內外局勢進行縝密的分析，其內部在談判策略的擬定、執行和考核，有嚴密的機制，例如在談判過程中，其談判代表與中共中央經常保持緊密的聯繫，必要時還以「尚未請示」或「未獲授權」來迴避其所不樂見的議題。¹¹²另外毛澤東在參加重慶會談之前，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以凝聚黨內的共識，並在重慶談判結束返回延安後，發表〈關於重慶談判〉，向內部進行報告。同樣的在國共進行完戰後初期的談判後，周

¹¹¹ 《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5年9月19日，頁26。

¹¹²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1月11日記事」，頁213。



恩來一返回延安也迅速提出〈關於國共談判〉的報告，將談判的作法與經驗做有系統的整理。從中共陣營的這些作法，我們可以瞭解其內部的溝通管道是暢通而管理嚴密的。

第三在追求合法政治地位方面，由於當時國民政府仍為一黨政府，在缺乏民主發展的空間下，中共透過談判來彰顯自身的主體性，並透過政治宣傳攻勢，以「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黨派平等化」等口號，吸引民眾和媒體的支持。周恩來在談判過程中，也特別提出「要互相承認，不要互相敵視」，並以承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蔣介石在全國的領導地位、國民黨為第一大黨等既成事實來換取國民政府的讓步。¹¹³

第四在策略選擇方面，國共雙方在當時對和戰的看法大致如下(參閱圖1)：雙方都明白合作可以帶給中國最大的利益，但談判必須互相讓步，以犧牲自身一部分的利益換取對方的合作(如第Ⅱ象限)；但雙方卻為了謀取自身最大的利益，而以軍事擴張為首要策略，並希望對方能接受和遵守談判協議(例如中共陣營的首選為第Ⅰ象限、國府陣營的首選為第Ⅲ象限)；雙方都對對方存有疑慮，如自己遵守協議，對方卻趁機武力擴張，將蒙受更大的損失(如中共陣營的最不樂見陷入第Ⅲ象限、國府陣營也不願意淪為第Ⅰ象限)；因此雙方如選擇軍事對抗，至少不會讓對方佔便宜，不過此情形將使整體的利益最小(如第Ⅳ象限)。

根據國共雙方當時實際交手的經驗來看，雙方在策略選擇上最期待對方遵守協議而自己勢力擴大；最不樂見自己遵守協議而讓對方勢力擴大；在互信不足的情形下，使得雙方傾向選擇對抗的策略。所以國共雙方基於自利選擇的結果卻陷入整體利益最差的困境，再加上談妥的協議缺乏約束雙方執行的力量，往往使得努力協商的結果徒勞無功。

¹¹³ 周恩來，〈關於國共會談的經過和經驗教訓〉，《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頁66-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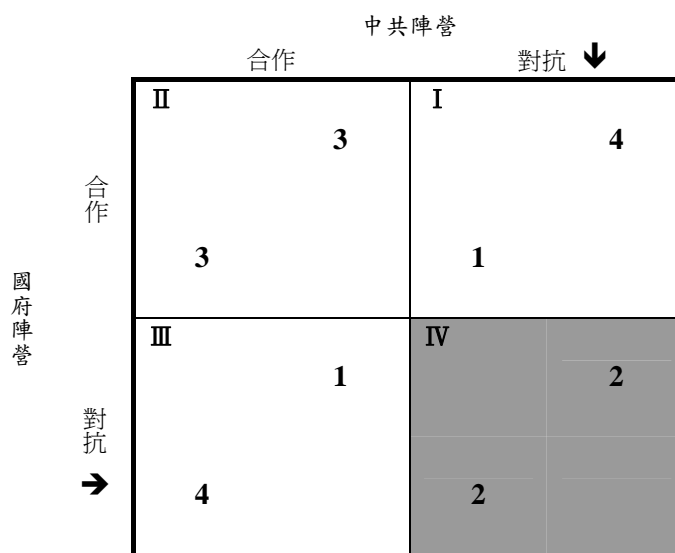


圖1、國共策略選擇偏好圖

說明：圖中的數字代表利益的大小(4>3>2>1)，由於選擇對抗的利益均較選擇合作的利益大，最後呈現雙方均選擇對抗的策略，產生總利益最小的均衡結果。

第五在談判技巧的方面，在重慶會談結束後，當國民政府正欲開始處理接收華北和東北時，中共運用蘇聯進佔東北和延緩撤軍的局勢，而力圖控制東北。此時中共陣營所關心的是受降、接收等資源配置的問題，所以要利用談判來限制國軍進兵東北並限制國軍利用日偽軍隊就地改編，故周恩來在此階段的談判一面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做籌碼，一面以「一籃子議題」的方式要求國府陣營通盤解決問題，並提出「分疆而治」的構想來保有戰果。到了國共進行「第一次停戰談判」的階段，由於杜魯門重申支持蔣介石，加上美、英、蘇外長會議共同宣示美、蘇軍隊將陸續撤離中國，中共在國際局勢對其不利和東北軍事落居下風的情形下，積極訴求「全面停戰」，以減緩國軍的攻勢。此外周恩來為了保有赤峰和多倫，也以「切割議題」和「擱置議題」的方式迴避爭議，並以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需要「好的基礎」，來交換國府陣

營的讓步。

最後就本階段談判的結果來看，在馬歇爾的調處下，雙方就停戰簽訂了四項書面協議，可謂成果豐碩，但因「國內軍事衝突及交通阻塞等事，要另組三人小組從速商定辦法，提請政府實施」，¹¹⁴擱置亟需規範的關鍵議題，由三人小組日後再議，此一作法又重蹈重慶會談關鍵議題懸而未決的覆轍。

總而言之，本時期為二次大戰後中國較有機會建立民主制度的階段，國共雙方也都知道合作對國家的未來最為有利，所以在本階段談判之後，隨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試圖透過政治手段來解決國共之爭。但雙方基於自利的選擇，加上中共在以小博大的權力結構中力求發展，始終都不願放棄武力，也使得雙方在談判桌上的長期努力，最後都功敗垂成。

¹¹⁴ 《停止衝突及恢復交通辦法》，輯於《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後中國(三)，頁66。



徵引書目

(一) 檔案、史料、日記、文集

1. 中央檔案館編，《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1992。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1984。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會編，《周恩來一九四六談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1996。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1998。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北京：人民，1997。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獻，2002。
7. 中共代表團梅園新村紀念館編，《國共談判文獻資料選輯1945年8月-1947年3月》，江蘇：人民，1980。
8.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重慶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紅岩革命資料館編，《重慶談判紀實1945年8-10月》，重慶：重慶出版社，1984。
9.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後中國(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10.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後中國(三)，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11.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12. 王成勉編，《馬歇爾使華調處日誌1945年11月-1947年1月》，台北：國史館，1992。
13.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4卷，北京：人民，1991。
14.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2001。
15. 金冲及編，《周恩來傳》1-4冊，北京：中央文獻，1998。
16. 〈政府代表與中共會談紀錄〉，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80104-015卷。
17. 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台北：傳記文學，1998。
18. 郭廷以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4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19.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華文，2007。
20. 劉必榮，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研究報告《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國共談判的戰術結構分析》，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未載出版時間。
21. 蕭良章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綱文備覽》第5冊上、下，台北：國史館，1996。
22. Marshall, George Catlett.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Arlington, Virgini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n, 1976.



(二) 專著

1. 毛磊、范小方，《國共兩黨談判通史》，蘭州：蘭州大學，1996。
2. 丘宏達、任孝琦主編，《中共談判策略研究》，台北：聯經，1987。
3. 李炳南，《政治協商會議與國共談判》，台北：永業書局，1993。
4.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台北：商務印書館，2003。
5.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1994。
6. 吳昆財，《政權之爭—戰後國共談判》，台北：唐山，1994。
7. 周敏、王笑天，《東方談判策略》，北京：解放軍，1990。
8. 邵宗海，《美國介入國共和談之角色》，台北：五南，1995。
9. 孫其明，《和談、內戰交響曲—毛澤東和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初期》，上海：上海人民，1992。
10. 郝晏華，《從祕密談判到共赴國難：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形成探微》，北京：燕山，1992。
11. 楊開煌，《談判策略研究—與中共談判》，台北：冠志，1994。
12. 楊聖清編，《中國共產黨談判史》，北京：中央文獻，2005。
13. 張戎、喬·哈利戴(Jon Halliday)，《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2006。
14. 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3。
15. 關中，《國共談判1937-1947》，台北：民主文教基金會，1992。
16. Lall, Arthur. *How Communist China Negoti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17. Zartman, I. William ed. *The 50% s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83.

(三) 期刊、研討會論文

1. 李守正，〈國共談判的歷史回顧(1936-1947)〉，《國家政策雙週刊》，第27期(台北，1992.02)，頁3-5。
2. 李英明，〈國共1944至1947年談判的檢討與反省〉，《東亞季刊》，第23卷第2期(台北，1991.10)，頁80-92。
3. 李俊融，〈論中共談判行為的特質與策略運用〉，《東亞季刊》，第32卷第3期(台北，2001.07)，頁60-88。
4. 汪朝光，〈戰與和的變奏——重慶談判至政協會議期間的中國時局演變〉，《近代史學研究雙月刊》，第1期(北京，2002.01)，頁14-43。
5. 林能士，〈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商談——以《王世杰日記》為中心的探討〉，收入《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近代史學會、聯經，1996，頁920-938。
6. 林能士，〈王世杰與抗戰勝利前後的中外交涉——以《王世杰日記》為中心的探討〉，於「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國際學術討論會」發表，山東煙台：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會、煙台師範學院，2004年8月9-14日。
7. 吳淑鳳，〈從王世杰日記看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近代中國》，第161期(台北，2005.06)，



頁25-37。

8. 栗國成，〈戰後初期的國共關係(1944年8-12月)〉，《國家發展研究》，第1卷第1期(台北，2001.12)，頁191-242。
9. 章百家，〈周恩來與馬歇爾使命〉，《近代史學研究雙月刊》，第4期(北京，1997.07)，頁184-213。
10. 張小滿，〈中國共產黨在重慶談判中爭取主動的方略〉，《南都學壇(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8卷第5期(南陽，1998)，頁13-17。
11. 趙建民，〈1935至1945年之國共和談：過程、爭議與中共策略〉，《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68卷下冊(台北，1994.03)，頁17-43。
12. 鄧野，〈聯合政府的談判與抗戰末期的中國政治〉，《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北京，2002)，頁187-202。
13. 鄧野，〈論國共重慶會談的政治性質〉，《近代史學研究雙月刊》，第145期(北京，2005.01)，頁30-64。

(四) 學位論文

1. 尹育華，〈中共談判戰略之研究——論重慶會談與政治協商會議(1945-1946)〉，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2. 徐保達，〈王世杰與民國政治〉，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3. 苟學珍，〈試論國共雙方對重慶談判的認識和態度的變化及其影響〉，重慶：西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2。
4. 高月，〈重慶談判期間國共兩黨關於地方政權問題的論爭〉，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4。
5. 陳長源，〈國共重慶會談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大陸問題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6. 劉傳暘，〈王世杰與中國外交1937-1949〉，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五) 網路資料

1. 〈梅園新村紀念館網站·國共南京談判史概述·人物〉，<http://www.myxc.com.cn/myGGTPS/index.htm>，2007年3月1日瀏覽。
2. 〈新華網·中國共產黨·時政在線·黨史·黨史文獻·1921-1949年文獻選編〉，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23/content_2609668.htm，2007年5月12日瀏覽。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Negoti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Chongqing Negotiation and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on Conference: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iary of Dr. Wang Shih-chieh”

Chen, Ying-chien

Lecture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De 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ollowing the Chinese vic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on the issues of takeover and demobilization, had been at loggerheads with each other.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uperpowers and the pressure and expectation from the domestic for peac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a Peac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CCP was finally held in Chongqing.

Despite the fact that an agreement was signed during the Chongqing Negotiati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in China then was wavering in great uncertainties. The global strategic maneuvering between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fierc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CCP all added to the uncertainties.

The period between the closing date of the Chongqing Negotiation and the opening of Political Consultation Conference, widely regarded as a turning point for China to establish its democracy system, inevitably became a period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ocus. The spotlight had been directed in the Patrick Jay Hurley-led political mediation of Chongqing Negotiation, the George Catlett Marshall-led maneuvering and settlement of the “First Truce Negotiation,” and even in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on Conference, attended by all the political parties then in China, aiming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Even though all the efforts ever made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CCP ended in vain, the



experiences handed down from the pugnacious clashes between them still worth our exploration.

This paper will center upon the “Diary of Dr. Wang Shih-chieh,” reviewing the negotiation strategies ever adopted by bo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CCP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Chongqing Negotiation and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on Conference. This paper will end with an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negoti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CCP, hoping to bring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ommunists’ style of negotiation.

Keywords: negotiation strategies, KMT-CCP relations, Wang Shih-chieh, Chou En-lai,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